



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

王崇齊

墨跡流傳小考

清代書家王文治曾言：「竊謂古帖雖致佳，必得名家臨做而精神倍出，其似與不似間，乃是一大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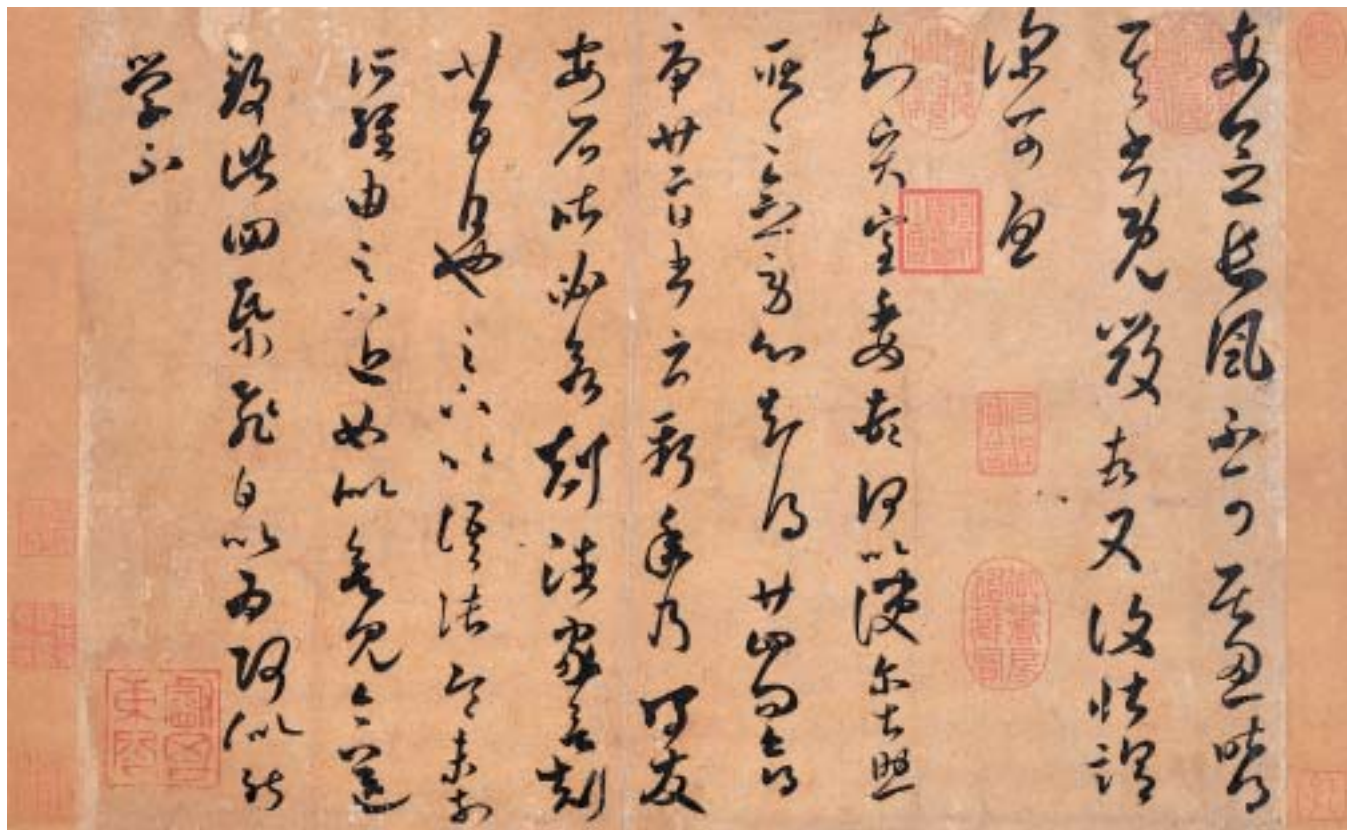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一卷，筆意流脫，線質潤澤，比之《淳化閣》所刻收王羲之《長風帖》拓影，更見院藏《長風帖》之墨韻神采。

經由釐析其傳藏軌跡，不僅可增進吾人對該件名跡的更深入瞭解，想來也可見褚摹《長風帖》精神倍出的風韻，在歷史中迤邐出一道輝光。

一、緒論

凡是書法的學習者、愛好者，必然對被譽稱為「書聖」的大書法家王羲之熟悉無比，無論是其在曲水流觴微醺寫成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抑或是其人書法入木三分、書寫《黃庭經》換鵝而歸的逸事，都為人所津津樂道。其書藝成就之高妙，更讓王羲之的書作珍希異常，收集者有之、臨習無間者有之、甚至以利之所趨，仿模以欺他人者亦有之。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便藏有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一卷（以下皆簡稱褚摹《長風帖》，典藏號：故書五五·圖一），本幅前有楷書題簽：「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十字。內文為草書十一行，分別臨摹自王羲之《長風帖》、《賢室帖》、《四紙飛白帖》三帖，

因臨摹祿為同卷，故以首帖「長風」名之。王羲之三帖蛻影俱見於《淳化閣帖》、《大觀帖》中，北宋時應為大內之物。存世褚摹《長風帖》之用筆通篇自然一貫，而墨色偏於暗沈，使人興起此卷或為雙鉤廓填摹本的疑慮。然而，仔細觀察其筆畫，即可發現線條隱映帶流動之感，應非摹本。另一方面，觀察《淳化閣帖》所刊王羲之三帖，可以發現《長風帖》用筆較為沈穩、點畫起止照顧周到；《賢室帖》筆致稍快而細，多連續而下的用筆；《四紙飛白帖》筆意較短，多短促重按倏出的用筆。因此，就風格上來看，三帖書寫時間應非同時。若褚摹《長風帖》確是摹本，則三帖何能首尾情調一致、筆致皆同，宛若一時一刻所書，故而今



圖一 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唐摹王羲之《平安奉橋何如》三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傳褚摹《長風帖》若出於褚遂良手筆，也是臨非摹，稱之為褚「臨」《長風帖》則可，云是褚摹《長風帖》則名實不稱。事實上，院藏唐摹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橋》三帖（圖二），亦是以王氏不同時間之書寫者摹為一卷，其三帖書風各呈殊致，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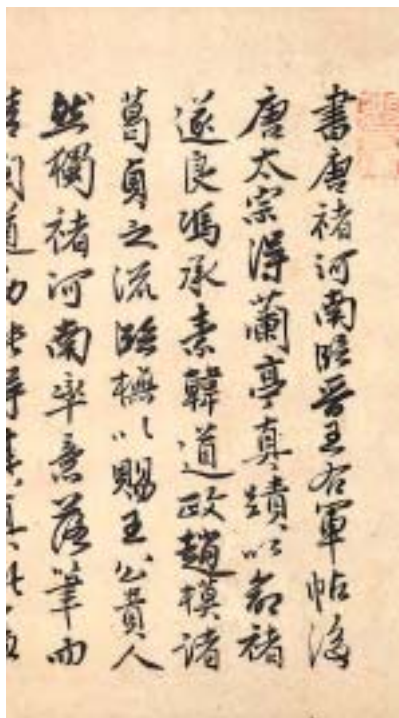
圖三 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觀思東閣」鈐記

本特徵顯而易見，應可與褚摹《長風帖》相互參看，以別臨書摹本之異同。

另一方面，該帖帖心紙色偏暗，或是作舊所致。進一步觀察該帖，發現線質流動自然，用筆、點畫似與米芾有相當的關聯，當為米芾之所臨所仿。筆者翻檢相關論述，才知現代碑帖專家王壯弘在其著作《帖學舉要》中，即明白斷定該帖為米芾臨書。而是帖與米芾風格之相關，其他學者亦有隨聲之議。^{〔註一〕}如此一來，該帖之書寫性質乃至於風格歸屬，可說已有相當程度的釐清，實無需蛇足添述。惟此帖之上鈐跡累累，又有多位名家跋書裱連於後，實可據以考察該作在歷史中的傳藏軌跡。復次，經筆者初步檢索、查考，不只該作之流傳歷史尚未有一清晰的整理，歷來經手此帖之收藏家生卒與帖上鈐記歸屬，亦未完全明晰。因此，考明其事，正可增添學界對該帖的考察與研究成果。

二、由米芾寫成到收入南宋高宗內府

一般而言，學書者要在書藝上有所進境與成就，對於前代名跡的持續臨學，正是重要的步驟與



法門。而臨學之際偶然合作的作品，便可能被書家置之架上、藏諸其家，褚摹《長風帖》被收藏、流傳的契機，當即由此而起。然而，米芾向以臨仿精善著名於書史，像褚摹《長風帖》這一類質佳的臨仿書作，還可能在寫就後就被收入好事家藏篋，米芾《書史》所載，也揭示了褚摹《長風帖》早期流傳的另一可能：

余（米芾）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余學臨帖，即收去，遂裝黏作二十餘帖，效《名畫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裝褙，一日出示，不覺大笑。

復次，褚摹《長風帖》帖心左下，有一「觀思東閣」鈐記（圖三），帖後曾榮（一三七一一—一四三二）跋書云是北宋徽宗印記，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在一九六三年出版之《故宮法書·唐褚遂良墨跡》或依其說，亦以此印為宋徽宗所有。惟上海博物館所編《中國書畫家印鑑款識》下冊及吳國豪皆以此印為南宋高宗內府鈐記。^{〔註二〕}事實上，此一印式亦見於王獻之《鵝群帖》墨跡及蘇軾《橙木詩》之上，其中《鵝群帖》墨跡被鑑歸為米芾臨仿，《橙木詩》又確是蘇軾真筆，由其書作性質、時代看來，兩者被收入宋徽宗內府的機率甚低，雖三印大同而小異，存在著真偽的疑慮，但將此一「觀思東閣」印式視為南宋高宗內府鈐記應較為合理。在此之後，一直要到明代初年，褚摹《長風帖》傳藏的跡痕才又出現。或是該帖經南宋收入內府後便深藏不



圖四 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卷後曾榮跋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出，遂令民間藏家無由得見，使得這段時間的傳藏歷史寂靜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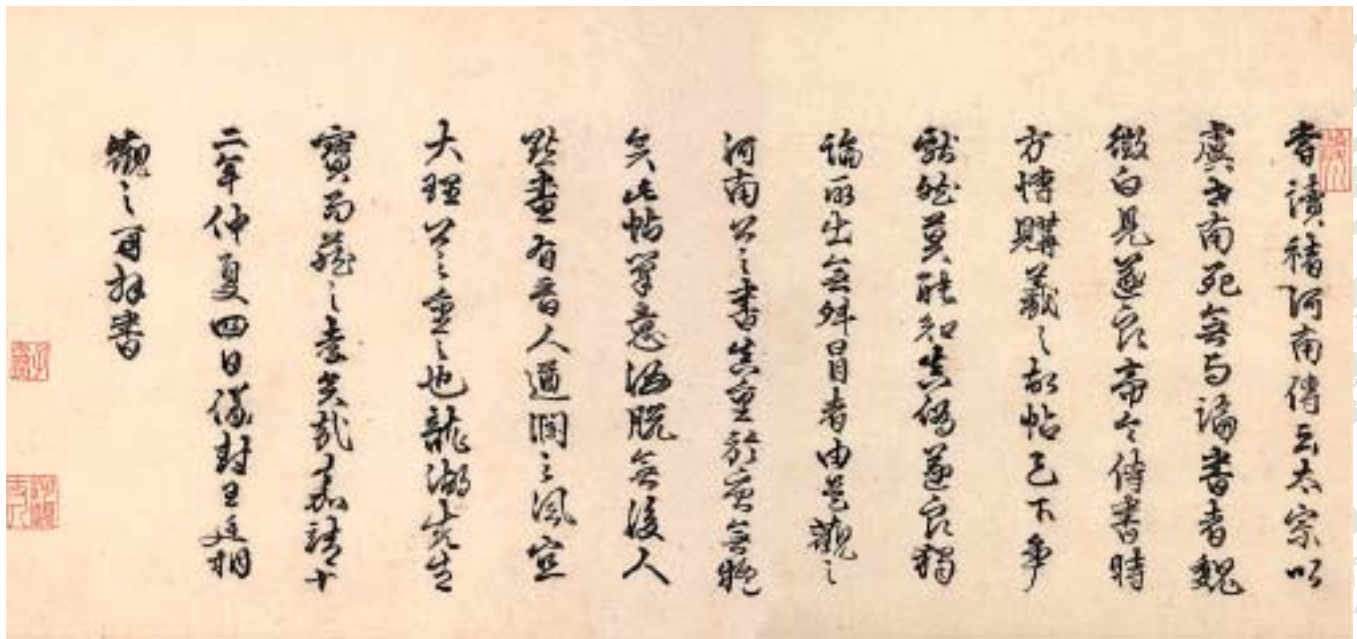
三、明代虞謙家族的收藏

褚摹《長風帖》的傳藏記錄，在明初之後幾乎絲縷可考，而名公的賞玩鑑跋，亦存附卷後，使吾人既知作品縱向的歷史轉移，又可味其作品與時人間的橫向歷史互動樣貌，可謂流傳有緒之作。明代曾榮（一三七二—一四三二）在宣德元年（一四二六）的跋書，是今見褚摹《長風帖》墨跡卷題跋中年代最早者（圖四）。曾榮字子啟，號西墅，明成祖永樂二年（一四一四）進士，著有《西墅集》。褚摹《長風帖》曾榮跋書上之「旻雨軒」、「西墅草堂」等印記，應即曾榮之齋館名號印。曾榮並非褚摹《長風帖》的擁有者，而是從虞謙（一三六六—一四二七）處借觀寓目，其云：

今大理卿金壇虞公出以示予，誠若殷彝周鼎、天球赤刀復見於世，豈非所謂重寶也歟。摩挲累日，不忍釋手。惟公以清才碩學蔚然為一時之望，而尤工於書，其寶而藏之，宜矣！展翫之餘，遂書此以歸之。

（圖四）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自號玉雪齋主人，能書能畫，永樂初召為大理少卿，《明史》卷一百五十有傳。有明一代褚摹《長風帖》雖經多手，然各個收藏者皆與虞謙有著或多少的親戚關係。由於虞謙



圖五 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卷後王廷相跋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官職不低，因此，不論是與虞謙有親緣關係的藏家，亦或是有幸過眼賞玩的題跋者，皆津津樂道這位曾收褚摹《長風帖》的名人。不止曾榮如此，後跋之王廷相、董其昌亦然，董其昌稱此帖「蓋宋時大內寶藏、虞氏天球也」，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九四）則以此帖：「宜大理公之重之也」；甚至到了清代，該帖已入清內府，王澐在《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七中，猶然稱此帖曾在「吾邑虞大理玉雪家」，其情可見一斑。

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王廷相從龍湖先生處獲觀褚摹《長風帖》，並跋其事由於帖末云：「此帖筆意流脫，無後人點畫，有晉人道潤之風，宜大理公（虞謙）之重之也。龍湖先生寶而藏之，孝矣哉。」（圖五）則吾人雖未知龍湖先生之姓氏為何，但由此可推得龍湖先生應與虞謙有親戚關係。翻檢張祥鳶《華陽洞稿》卷五、卷七，以及曹大章《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中〈先考戶部司務龍湖府君狀實〉一文，可知曹大章（一五二一—一五七五）之父曹邦彥曾官司徒大夫，字懋忠，正以龍湖為號，其女（一五一六—一五七六之後）又嫁適虞少龍，兩家親緣關係或由此來。曹邦彥輾轉收得此帖，因而重光先人手澤遺緒，所以王廷相才在跋文中書讚其孝。

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王肯堂（一五四九—一六一三）《鬱岡齋法帖》正值刊刻竣工，也是褚摹《長風帖》流傳的重要轉折。褚摹《長風帖》



圖六 《鬱岡齋法帖》刻收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卷後王肯堂跋書

的擁有者王肯堂，將其刻入《鬱岡齋法帖》之中，藉由拓本可化身千百以供流傳的性質，褚摹《長風帖》的樣貌將可能被更多人所見所賞，雖無其墨跡真本，也可據拓影想像原本風韻。而王肯堂在刊石之際的跋書，也交代了褚摹《長風帖》過往與將來的去向：

（褚摹《長風帖》）外高祖大理卿虞玉雪公所寶藏，余童時得之。今將歸其裔孫大復，因勒石與賞鑑者共焉。萬曆辛亥（一六一一）初夏肯堂力疾識。（圖六）

由於跋語具言王肯堂幼年便得藏此帖，距曹邦彥之收藏年代猶近，是以由曹邦彥藏篋到王肯堂之手，褚摹《長風帖》的傳緒應未經太多轉折。另由焦竑《焦氏澹園集》卷三十三可知，王樵（一五二一—一五九九）之妻，乃是虞通庵之女，又《華陽洞稿》卷八〈虞石湖先生行狀〉有載虞謙至虞通庵間的世系傳承，足證王肯堂之稱虞謙「外高祖」者，實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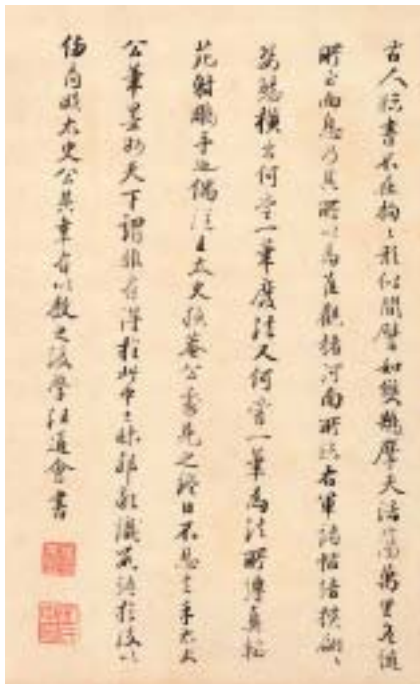
信而可徵之事。其跋文又稱褚摹《長風帖》墨跡刊入《鬱岡齋法帖》後，該本墨跡將交由虞謙裔孫「大復」收藏，經查《焦氏澹園集》卷三十三亦載王肯堂正有名為虞大復之姪婿，因此，在王肯堂之後，褚摹《長風帖》當歸虞大復收藏。（註三）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王肯堂不僅是明代著名法帖《鬱岡齋法帖》的刊刻者，其亦精於醫術，著有《證治準繩》一書，是明代有名的醫學家。這樣的身份，也在褚摹《長風帖》的內容釋讀上發揮了影響，當董其昌在一六三一年追憶昔日往事之時，便跋書其事於褚摹《長風帖》卷後，其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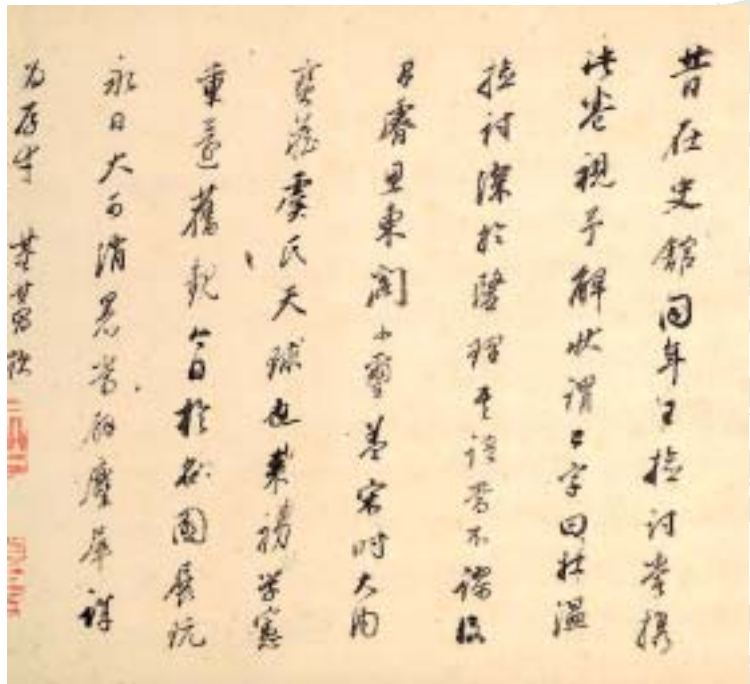
昔在史館，同年王檢討（王肯堂）嘗攜此卷視予，解「狀謂」二字曰：「壯溫」。

檢討深於醫理，其語當不謬。（圖七）

二人對褚摹《長風帖》的內容認知雖未必一致，但王肯堂顯然以其對醫學的熟悉說服了董其昌，對於帖中疑似「狀謂」而不可索解的二字，改



圖八 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卷後汪道會跋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卷後董其昌跋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醫學名詞「壯溫」代之。而在董其昌跋書追憶的同時，褚摹《長風帖》也已進入流傳的下一站，此時該帖已是某位任官學憲的「來初」所有，董其昌云：「（褚摹《長風帖》）蓋宋時大內寶藏，虞氏天球也。來初學憲重還舊觀，今日於名園展玩永日，大可消暑。當辟塵犀，誠為厚幸。」（圖七）至於來初學憲為何人？筆者索查無方，不得而知。^{（註四）}惟董其昌記錄此事時自然的提及虞謙與王肯堂，則來初或許也與虞謙家有親緣上的聯繫，當然，也可能是董其昌基於與王肯堂家的熟稔，對王、虞兩家收藏掌故信手拈來的直書敘述而已。

附帶一提，褚摹《長風帖》卷後尚有汪道會（二五四四—一六一三）跋書（圖八），並未書年月，惟文中提及在「王太史損菴公（王肯堂）」處獲觀此帖，故書跋年月約在一六〇四年王肯堂獲授翰林院編修檢討到王肯堂讓出褚摹《長風帖》的一六一一年之間。就其順序與跋語時間看來，董其昌跋語位置錯置，或是董其昌檢選卷中空處題之。此外，王肯堂在《鬱岡齋法帖》中褚摹《長風帖》的帖後跋語，並未見於褚摹《長風帖》本件中，或是王肯堂僅跋於石後而未書於帖卷之上。

四、清代迄今的傳藏

明清鼎革之後，褚摹《長風帖》首次入藏於非虞謙族裔之手。由卷上「廣陵李書樓珍賞圖書」、「孔」鈐記，知此時該卷藏收於清人李宗孔手中。



圖九 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秘園」鈐記

此二印式亦見於院藏米芾《翰牘九帖》。值得注意的是，李宗孔與同時代的重要收藏家笄重光（一六二二—一六九二）多有往來，不但部分笄重光的法書收藏後歸藏於李宗孔，李宗孔篋中寶藏亦有請笄重光鑑賞之記錄。因此，褚摹《長風帖》卷上的「潤州笄重光鑑定印」鈐記，可為二人之文藝交流添一見證。^{〔註五〕}另一方面，張伯英跋李宗孔《李書樓正字帖》有云：「李書樓正字帖七卷，卷尾有宛陵劉光信勒於秘園。」^{〔註六〕}又王翬《趨古》冊後有李宗孔跋語，主筆言此畫卷乃「客於維揚李氏之秘園」所作，則直指「秘園」為李宗孔家宅園。^{〔註七〕}再參照院藏關仝《秋山晚翠》左下有「秘園」、「廣陵李書樓珍賞圖書」上下並鈐，二印印式與褚摹《長風帖》內所鈐者全同，故知褚摹《長風帖》首「秘園」印（圖九）亦是李宗孔所有。而《故宮法書·唐褚遂良墨跡》書中所未釋出之「秘」字，也可得到確釋。

褚摹《長風帖》有「瑯湖珍秘」、「王氏珍藏書畫之印」，兩印位置相近，應是一人所有，著錄中亦載兩印同鈐於其上之帖目。^{〔註八〕}兼以清人王頊齡（一六四二—一七二五）以瑯湖為號，故歸其名。另筆者雖未十分確定褚摹《長風帖》在李宗孔與王頊齡的遞藏順序，除暫以年齒先後順序之外，考慮一般藏家鈐押收藏印於名跡時，往往檢取作品下方空處為之，歷時經久，遂使收藏印記由下而上的順序，常常暗合於作品遞藏史的推移。而李

氏之印鈐據本幅接紙下方二角，其中左下角押印上接王頊齡印記，據此可以推測二人藏收此帖之先後。

王頊齡，字顯士，江南華亭人，康熙丙辰（一六七六）進士，著有《世恩堂集》，《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七有傳，其弟王鴻緒亦為清代收藏家。

今據褚摹《長風帖》上的清室收藏五璽：「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御書房鑑藏璽」，則是帖在一七五四年《石渠寶笈》成書之前已入清宮，《石渠寶笈》有錄。^{〔註九〕}另清末民初鄧之誠（一八八七—一九六〇）《古董瑣記》卷七載褚摹《長風帖》曾移於懋勤殿後廚房南間。如此重要的法書名跡何以藏置廚房之中？曾職任點查清宮舊藏文物的莊嚴，對此也提出了其自身的觀察與看法，其云：

又有些極名貴之件如盧鴻草堂十志 褚河南長風帖 等二十卷，點查時都在懋勤殿後一間小廚房發現，這個地方決非儲存書畫之所。何以到這裡呢？定是後人搬來的，不是大臣，便是太監偷竊，預備私運宮外的初步。^{〔註十〕}

幸而褚摹《長風帖》早經點查登錄，不然也會像許多法書名跡一般，無由於故宮之中一見了。

五、結語

褚摹《長風帖》以王羲之書作為臨寫對象，該

帖之摹書者又歸褚遂良名下，正以褚遂良距離東晉時代既近且深於王羲之書學，則在王羲之墨跡珍如星鳳，以及存世多為碑拓的情況下，褚摹《長風帖》墨跡自然成為人們跨越碑拓藩籬、追尋王羲之墨跡神采的依憑。王肯堂跋書褚摹《長風帖》有云：

右唐摹右軍三帖，郭填精妙，相傳為褚河南筆。《淳化閣帖》第七卷具刻，乃並形似失之，況丰神乎。益以見唐摹之可貴而閣帖之不足尚也。（圖六）

無獨有偶，清代王澐《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七有同樣的述論：

此帖（褚摹《長風帖》）有褚公摹本，刻吾家鬱岡帖中，比之官閣本，相去懸絕，官閣本模搨多失真，即此可見。

經由品鑑褚摹《長風帖》的風格，而有《淳化閣帖》不足取法的觀念形成，不但更確認褚摹《長風帖》墨跡的重要性，也顯示了褚摹《長風帖》流傳過程中與書史的積極互動，由此還可進一步探知書史的豐富內涵與認知的流變。再者，由於臨摹書作的特殊性，褚摹《長風帖》所承載的風格訊息便不只一端。觀者既可在其尋覓臨仿者的風格樣貌，增添自身對於書寫者風格的掌握，也可取之與臨摹學摹取的對象並陳，對本比勘，品賞二者各自的風韻殊致，凡此種種，皆可在基礎的流傳史考察之後順序開展，也是筆者釐清流傳歷程後的進一步期待。

註釋

- 一·王連起，〈談談明《鬱岡齋墨妙帖》〉，《中國法帖全集》第十四冊，武漢：湖北美術，二〇〇一，頁三。
- 二·徐邦達則以此帖「定出勾填」，對此，筆者意見雖與徐邦達相左，但徐邦達亦以該帖與米芾所書之《元日帖》結體、筆法「大都有些相近」，也肯定了褚摹《長風帖》在風格上與米芾的關連。文見徐邦達，〈褚遂良書帖兩種辨偽〉，《收藏家》，總二期，一九九三，頁三三。
- 三·吳國豪之論據大略有二，一以史載北宋君主之收藏，法書並未有鈐「睿思東閣」者；二為蘇軾《楷木詩》、王獻之《鵝群帖》以及褚摹《長風帖》墨跡，皆有一「睿思東閣」而無宣和七璽。然而，睿思東閣成於北宋，法書名畫皆可入之藏蓄，以之為印文內容，或未限於法書藏收之鈐押，若考慮傳世顧愷之《女史箴圖》、韓混《五牛圖》等劇跡上鈐之「睿思東閣」印記，史載亦未及此，是以未必能以史載之有無推定其論。吳國豪之論據見其著《宋高宗書史地位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七，頁一三三、一三六、一三七。
- 四·筆者所閱《焦氏澹園集》版本，為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六十一本與《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三六四本者，筆者文中引用所據，皆刊於該卷末頁，惟就其文意審之，似缺前頁。筆者以為該殘頁所述應為王樵之事，故取以為論據。
- 五·由於跋文中「來初」二字並非明顯可辨，筆者未敢遽定其字釋。今暫以「來初」為據查而索之，若筆者另得相關輔助資料，或可參證識讀其正解，並補論據之錯誤與不足。
- 六·劉洋名，《管重光（一六二三—一六九二）及京口地區的收藏與書風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二〇〇四。
- 七·容庚，《叢帖目》第一冊卷五，台北：華正書局，一九八四，頁四一三。
- 八·Roderick Whitfield, *In Pursuit of Antiquity*,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9, pp.138, 142.
- 九·《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二，頁三三二。
- 十·《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二，頁九三三。
- 十一·莊嚴，《山堂清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〇，頁八四。